战后中日关系论略

孟宪凤

(哈尔滨师范大学 社会与历史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 战后中日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即冰封期、暖春期和后冷战时期。具有中日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严重制约、双方关系伴随着徘徊和停滞逐步向前推进、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原则与两国间“政冷经热”现象三个明显特点。决定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主要有国家利益、国家政策和制约力量三类因素。它们最终决定今后的中日关系主要以良性发展模式向前推进, 出现恶性倒退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关键词】 战后; 中日关系; 良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2012)04-0113-05

On the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MENG Xian - feng

(History Department,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of Post - World War II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namely, Frozen Era, Warm Spring Era and Post Cold War Era.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have seriously restricted by China - US relations,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gradually advance with wandering and stagnatio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political separation" principle and "Cold Politics and Warm Economy" phenomen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National interests, national policy and restricting power, which both determine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They finally determine of the futur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mainly positive development, the possibility of malignant setback is limited.

Key words: Post Cold War Era; Cold Politics and Warm Economy; Benign development

二战结束后的中日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呈现出怎样的结构性特点, 其对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启示, 中日关系的未来将走向何处等诸多问题, 一直是中日两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战后中日关系分期

关于战后中日关系的分期, 主要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等观点。二分法以 1972 年中日建交为界, 将 1945 年至今的中日关系分为两个时期^[1](pp. 25 - 27); 三分法将战后至 1995 年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和 1971 年中日建交作为两次分界线^[2](pp. 6 - 7); 四分法将战后中日关系分为两国代表友好接触、群众团体友好互访、政府之间友好交往、邦交正常签订友好条约四个时期^[3](pp. 61 - 63); 还有学者的划分更为细致, 将这一历史时段划分为九个时期^[4](pp. 3 - 4)。但笔者认为,

以上分法并不能完全勾勒出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动态, 应对其进行进一步划分。关于分期的依据, 有学者认为, 应首先考虑国家关系的变化, 再考虑民间关系的发展^[1](p. 19)。笔者认为, 以上是考虑战后中日关系分期的基础, 但也应顾及国际格局与战后中日关系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故此, 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一) 冰封期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至 1972 年中日建交前)。其时为中日两国无国交时期, 亦可分为国民党参与对日媾和阶段、两国间无交往阶段、民间经贸往来阶段和半官半民经济的半建交四个阶段。1945 年 8 月, 日本战败投降后, 中日关系主要以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华民国参与对日媾和事宜为主。在 1947 年的第一次媾和尝试中, 国民党政府提出了 2/3 表决机制和四大国一致的意见^[5](p. 118)。但在 1948 年以后, 随着冷战格局的逐步展开, 以及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 对日政策有所

【收稿日期】 2012 - 04 - 12

【基金项目】 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阶段成果, 项目编号 12512154。

软化。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曾一度奉行全面媾和路线，而在芦田外交期间，开始向片面媾和转向。日本在1947年7月制定的“芦田备忘录”中表示，对美英片面媾和，对内加强警察力量，对外提出同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等^[6] (pp. 51-55)。至吉田茂再次组阁后，最终确立了片面媾和路线^[7] (pp. 101-103)。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以片面的《对日和约》、《美日安保条约》和《日台条约》为基础，对中国奉行孤立不承认、实行分裂中国的“两个中国”和“政经分离”政策，导致从1949年至1972年中日建交23年间，两国政府间并无正式外交关系。尽管如此，由于中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这一时期两国在民间交往、经贸合作和文化往来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后来两国的正式建交奠定了坚实基础。此间，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有高良富访华、片山哲访华和确立“L·T贸易”体制等。其中“L·T贸易”体制的确立堪称中日贸易发展的里程碑。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亦称L·T备忘录)，商定中方对日出口煤、盐、大豆等，从日本进口化肥、钢材和成套设备等。“L·T办事处虽然仍为民间贸易机构，但其背景是日本通产省和中国外贸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半官方性质。”^[8] (p. 817) 此协定开辟了两国间新的贸易途径，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意义重大，当年中日贸易额就达到1.37亿美元^[9] (p. 171)，日本的友好商社也由1961年的86家增至包括银行在内的200家^[10] (p. 269)，中日贸易出现回暖的迹象。

然而，1964年11月佐藤荣作上台后，即奉行“一中一台”和“政经分离”政策，在上台之初即表示要“维持与中华民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11] (p. 330)。1967年甚至亲自“访台”，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因此，在其执政期间，中日关系跌至低谷。

(二) 暖春期(中日建交至苏联解体前后)。此时中日两国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是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这一时期，两国签订了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和平友好条约，把两国友好关系推向新的高潮，使复交后两国实现了更大规模的全面交流。尽管这一时期中日间在历史、领土、经贸等问题上偶尔也发生一系列摩擦，但这些摩擦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和及时解决。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局势的变化已经非常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明显增多，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而此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内外交困。国际上，美国受到来自苏联的竞争压力，美国决定联合中国共同对抗苏联。在此背

景下，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改善，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契机。而美国的“越顶外交”也使日本陷于被动，迫使日本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对美实行“超前外交”。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1978年8月，中日两国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上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其中的“反霸条款”更表达了两国人民要以实际行动为亚洲和世界的真正和平与霸权主义作斗争的决心。

这一时期，两国政府间加强了政治交流，双方政府首脑、议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首脑频繁互访，建立了两国政府成员会议制度，使两国的政治关系更加密切。中日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84年底，中国已有60所高等院校和日本的50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与此同时，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猛增到6870人(含台湾地区)^[12]。1979年，大平首相访华时承诺提供对华低息优惠贷款，此后日本经济界对华投资逐年增加，两国间的经贸往来和技术合作有了明显的发展。

(三) 后冷战时期(从苏联解体至今)。中日两国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冷战格局的终结对世界格局和亚太格局影响巨大，中日关系亦不能例外。首先，这一时期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中日两强的局面已初露端倪，中日竞争心理日益增大。其次，由于苏联的解体，日本来自苏联的威胁消失，使日美关系中的安全保障因素有所减弱。于是，日本希望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减弱其追随外交之形象，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再次，日本为了缓解由于日美经济摩擦所带来的压力，也需要密切同中国的关系。最后，为了作为独立的一极并力图提高其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离不开中国的支持。

此外，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亦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进入90年代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但日本的经济开始出现衰退，“1992年2月25日，日本政府发表的2月份月例经济报告承认，日本经济出现了衰退。”^[13] (p. 684) 此后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时至今日仍未出现明显的景气。与此同时，日本的“55年体制”也开始趋向崩溃，自民党在1993年7月大选中惨败，导致自民党政权被“7党1会联合政权”取代，使“55年体制”寿终正寝。1994年9月，日本社会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强调，冷战结构和1955年体制已经崩溃，社会党已经变成支撑首相的负有责任的政党^[14]。

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日本政局的不稳，从该阶段一开始，中日关系就逐渐出现重新调整的波动式局面。

1995—1996年，中日关系甚至陷入复交以来的最低谷，出现了“政冷经热”局面。虽然1997年出现了短暂的“回暖”，但2001年以后，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五年间六次参拜靖国神社，还宣称“日本不鞭打死人”^[15]，并提出所谓的“文化特殊论”，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冷、更长的第二次“政冷”低谷。此后，安倍、福田先后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逐渐“回暖”，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被称为“暖春之旅”的正式访问，与福田首相一道，为站在新历史起点的中日关系做了重新定位和定向。

二、战后中日关系的主要特点

战后中日关系既继承了历史上两千余年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又受到众多现实条件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并呈现出与以往既相似又相异的新特点，归纳概述如下：

(一) 中日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严重制约。二战结束后，日本处于美国占领之下，其内政和外交均仰美国之鼻息。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力图利用日本对抗中苏，形成了片面的旧金山媾和模式。1951年9月，《美日安全条约》签订，规定美国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可以为镇压由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给予援助^[16] (p. 394)，针对中苏的意味已非常明显。1952年2月又签订了《美日行政协定》，在联合国司问题上，甚至得到日本吉田首相在紧急时刻美日联合军队由美军司令官指挥的口头保证^[17] (p. 227)。通过以上条约，两国间形成美主日从的军事同盟关系，日本也以此作为其战后对外政策的基轴。1952年4月，在美国的促成下，日本与中国台湾之间又签订了非法的《日台和约》，严重损害了新中国的利益，使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严重受阻。可以说，正是由于美国在战后压制日本、禁止日本同新中国接近，使中日两国20多年间并未形成正式的外交关系。有学者精辟指出“中日间的‘不友好’关系既是日本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对中日关系实行‘分而治之’的成果。”^[18] (p. 275)

1972年，中日建交亦体现了日本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致。尼克松“越顶外交”的实施令日本政府非常难堪，田中角荣上台后即开始考虑中日建交事宜。为了谋求美日两国在对华问题上的协调一致，1972年8月31日至9月1日，田中角荣与尼克松在夏威夷会晤，并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通过会谈，日本承诺不破坏美日同盟关系，美国则向田中的中国之旅开了绿灯。正如大平正芳所说，日本“至少拿到了去北京的单程票”^[19] (p. 330)。此后，中日建交顺利进行。冷战结束之后，美日同盟又经过了多次调整，2002年12月举行的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甚至使此种同盟关系的适用范围超越亚太地区

而具有全球意义，但美日同盟作为日本外交基轴的态势并未改变，中日关系仍然受到中美关系的严重制约。

(二) 中日关系伴随着徘徊和停滞逐步向前推进。中日两国两千年关系史表明“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呈螺旋上升的趋势，个别时期和个别阶段可能出现倒退或停滞的现象，但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20] (p. 2) 此即中日两国关系史的总体发展曲线，以战后60余年的区间进行考察，亦能体现出这一特点。

战后中日两国经历了20余年的无国交阶段，既损害了两国间的国家利益，也给两国人民带来了深深的遗憾。直至1972年中日建交，两国关系终于实现正常化。而即使在建交后至冷战前的“暖春期”，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亦偶尔受到严峻的考验。1989年6月，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之后，在所谓真相模糊与追随西方的两种因素作用下，日本同西方国家一道对中国实行制裁。6月7日，日本政府发出“关于前往中国的自慎劝告”，奉劝国人“以不去访华为好”^[21] (p. 388)。而且日本政府还停顿了未完结的第二次对华日元贷款，并中止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交往再次出现停滞。日本政府也因此遭到日本国内政界、学界和财界部分人士的批评。以上做法也不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鉴此，时隔不久，日本政府较早地采取行动，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取消对华制裁。至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时，两国关系终于完全恢复正常。以上事实均说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即使偶遇挫折，但终究不断向前发展。

(三) 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原则与两国间的“政冷经热”现象。在冷战大背景下，亚太地区形成了对华封锁的“日美台体制”，决定了中日间在政治上难有突破性进展。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还存在强烈要求对华进行民间交往的人士和团体。为了平衡美国、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国民，以及未来日本对华关系发展等多重利益的要求，“政经分离”政策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应运而生。大平正芳曾对中方解释道，中国政府不论对方是否为共产党国家，只要对方不把政治问题带到贸易中来，也就是说，在正经分离的原则基础上，中国就与之开展贸易活动。这并不背离我国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立场，我们将与贵国增进友好亲善关系^[22] (p. 719)。对于这一原则，中国政府从未真正接受或认可过，而是坚持“政经不可分”的原则对其进行批评。但同时中国政府本着与日本人民友好的愿望，采取了一条为最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以民促官”、“民间先行”的对日政策，直至佐藤内阁后期，由于其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才严格将“政治三原则”、“政经不可分”等对日原则作为两国间的政治基础和谈判前提。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原则最终随着国际及东亚冷战局势缓和、中美关系的和解而终结。

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并未解决两国间所有的政治问题，一些问题甚至成为以后中日交往的主要障碍。进入80年代以后，中日间常因历史教科书事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以及钓鱼岛问题等受到影响，它们构成了中日“政冷”的主要因素。而与此同时，中日间经济上的互补性成为两国间进行经济交往的主要动力。而且在日本民间存在着要求进行中日经济文化交往的民间团体，他们成为沟通两国政府的“桥梁”，推动两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不仅为两国民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由往来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为两国经济进一步趋“热”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但是，在国际局势日益走向缓和、世界经济日益趋向全球化的今天，中日两国人民所期待的是“政热经热”，这才是两国人民的福祉所在。

三、中日关系前瞻

回顾战后中日关系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可见，中日关系始终在颠簸中前进。概观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不外乎有两种形态：良性发展与恶性倒退，此外，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性徘徊。但考察中日历史上的中性徘徊阶段来看，两国间的民间贸易仍然在不断发展，因此，大体上也可将其归入良性发展的一列。那么决定两国关系形态的因素有哪些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国家利益、国家政策和制约力量三类，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最终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但维护本国经济发展和保持领土完整一直都是其中的核心内容，而中日之间的国家利益既有交叉也有冲突。就经济而言，中日之间的经济虽然有竞争的方面，但主要以合作和互补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对外资、技术的要求比任何时候都大，中国政府也因此修改了合资企业法，放宽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而日本此时经济进入低迷阶段，国内生产成本提高，许多企业开始寻找海外生产基地，中国自然成为了比较理想的选择对象。而且这一期间中国经济腾飞和日本经济萧条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特需”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两国间经济上的互补性持续扩大。

领土问题一直是两国间比较棘手的问题，而领土问题往往和资源、人口联系在一起。对于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领土问题更加敏感，钓鱼岛问题即可归于此类。从历史和地理角度看，无数事实证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1967年，日本学者在《日本的科学与技术》上发文指出，在钓鱼岛附近可能埋藏着石油^[23]（pp. 42-65），引起了日本各界的重视。1969年5月8日，佐藤内阁正式在钓鱼岛设立了水泥标识^[24]（pp. 42-65），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严

重抗议，也成为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条约时，中日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将这一问题搁置起来，留待以后解决。钓鱼岛问题虽未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但其潜在的障碍因素正日益明显。中国对领土之争一贯主张和平协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种主张虽未得到日方的完全响应，但从事实上看，上述搁置规避的方法也是日本政府所能接受的办法之一，这为两国避免因此问题发生冲突提供了可能。

台湾问题也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问题。台湾地区从甲午战争之一——至日本战败投降约50年的时间，曾处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之下，时至今日，仍有一部分日本右翼和一部分台湾亲日势力对这段历史情有独钟。但台湾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台湾也绝非日本的领土，因此，不涉及日本的核心国家利益。所以说，因台湾问题导致中日关系的恶性倒退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此外，中日之间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如教科书、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对侵略战争的态度等历史认识问题，但这些问题属于一般国家利益问题，与前述的核心国家利益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虽会引起两国间激烈的争论，但不会使两国间的关系发生本质的改变。

（二）国家政策。这里主要指政府在当前及今后对本国政治、经济和外交发展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日本在二战后的地区战略主要是吉田主义，即通过积极的政治和经济外交，通过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追随美国的外交战略，确保地区稳定并提升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这显然和日本历史上的大陆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大陆政策是指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可见，大陆政策是进攻型的，而吉田主义是保守和稳健型的。

就中国而言，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内敛型文化，崇尚和平，因此，在历史上，中国鲜有进攻性的对外战争。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世界，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希望和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由以上可知，两国的国家政策虽然有所不同，但绝非针锋相对。这就决定了在当前条件下，两国间完全可以相容共处，互惠互利。

（三）制约力量。这里的制约力量主要是指促进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积极因素。归纳大致如下：

1. 地理因素。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比邻而居。近现代以来，中日交往的很多因素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但只有中日间的地理因素，即邻里关系从未发生变化，

它构成中日友好交往的地理基础。2. 历史因素。中日两国间有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这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这种悠久的交往历史,构成了中日友好的历史传统。当然,客观地讲,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忽必烈征日、明朝抗倭战争,近代以来的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的不幸时期,但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只是短暂的溪流,并不影响中日友好大局。3. 文化因素。由于长期的相互学习和相互交往,中日两国间形成了文化传统相近、文字相近、习俗相近、传统道德相近、宗教相近和文化理念相近的鲜明特点。这些都为中日两国间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提供了便利。4. 经济因素。中日两国经济有着很大的互补性,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缺乏技术资金,而日本经济发达,资金充沛、技术先进,需要扩大海外市场和利用国外的劳动力资源。这种经济上的互惠互利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5. 感情因素。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过去的侵略战争,日本人中间普遍存在着对中国的负罪意识,因而支持日中友好。”^{[2] (p. 416)} 尤其是那些曾经经历过二战或曾因战争原因在中国生活过的日本人,对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刻骨铭心,他们竭力主张中日友好,并为中日友好事业贡献力量。6. 历史经验。中日两国文化相近,都是重视历史、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民族。而中日两国间的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每当中日两国保持和平交往、互通有无之时,则有利于两国的发展;而当两国关系破裂、闭关隔绝甚至发生战争之时,则损害了两国的根本利益,给两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有学者对此总结为“以史为鉴,以和为贵”^{[20] (p. 3)},还有学者总结为“和则两立,斗则两伤”。历史是一面镜子,两国人民对此不可能视而不见,它构成了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

由上可知,中日两国间存在着众多并且雄厚的制约力量。当两国间国家利益出现冲突、国家政策出现对立之时,这些制约力量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修正,从而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综上所述,从战后至今,中日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冰封期、暖春期和后冷战时期。这段时期中日关系还存在三个明显的特点,即中日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严重制约;中日关系伴随着徘徊和停滞逐步向前推进;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原则与两国间的“政冷经热”现象。而从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决定中日关系未来走向是良性发展还是恶性倒退的因素主要有三类,即国家利益、国家政策和制约力量。在国家利益问题上,两国既有交叉也有冲突,但即使是存在领土冲突问题,亦可以通过搁置规避的方法得到暂时的缓解;在国家政

策问题上,中国采取的是善邻友好的对日政策,日本实行的是确保地区稳定、提升日本政治地位的吉田主义,这就决定了两国间完全可以相容共处,互惠互利;在制约力量问题上,中日间存在着众多并且雄厚的制约力量,它们会对中日间的不利形势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从而有利于中日两国间的良性发展。据以上三类因素大体可以判断出,今后中日关系主要会以良性发展的模式向前推进,出现恶性倒退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编. 日本的中国移民[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 [2] 田桓主编. 战后中日关系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3] 张丽波. 简论战后中日关系的进展[J]. 辽宁大学学报, 1993, (3).
- [4] 孙乃民主编. 中日关系史: 第三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5] 迈克·沙勒. 亚洲冷战与日本复兴[M]. 郭俊铄译. 台湾: 金禾出版社, 1991.
- [6] 細谷千博. 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への道[M]. 中央共論社, 1984.
- [7] 孙瑜. 战后初期日本外交与片面媾和轨迹的形成[J]. 北方论丛, 2010 (6).
- [8] 刘德友, 冯兴国主编. 中日文化交流事典[Z].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
- [9] 岡本三郎. 日中貿易論[M]. 東洋經濟新聞社, 1971.
- [10] 朝日年鑑[M]. 1964.
- [11] 石川忠雄などの編. 戦後の日中関係資料[M]. 日本評論社, 1970.
- [12] 田桓主编. 战后中日关系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388
- [13] 冯玮. 日本通史[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 [14] 産経新聞[N]. 1994-09-04.
- [15] 産経新聞[N]. 1994-02-10.
- [16]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际条约集(1950—1952年)[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 [17] 明田川融. 日米行政協定の政治史——日米地位協定研究序説[M]. 法政大学出版社, 1999.
- [18] 廉德瑰. 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1949—1972)[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 [19] 大平正芳回想録[M]. 東京: 大平正芳回想録刊行会, 1983.
- [20] 孙瑜, 李晓航. 两千年中日关系史稿[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 [21] 田桓主编. 战后中日关系史文献集(1971—1995)[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22] 大平正芳訪中一ツ[A]. 外務省の外交記録(マイクロフィルム), A0359.
- [23] 沖繩(季刊), 第56号, 1971年3月29日.
- [24] 外務省. 日中関係の基本資料集[M]. 東京: 霞山会, 1998.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晓校]